◆东敲西击　俞可

正谊明道

颜福庆（资料图）

今年“两会”议题，公共卫生为重中之重，此乃疫情防控常态化使然。疫情防控能够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厥功至伟。其奠基者颜福庆便在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言献策。

1928年11月7日，美国《密勒氏评论》的“中华名人录”专栏隆重推介颜福庆，强调其对公共卫生与慈善事业所做贡献。是年，我国中央政府首次设立卫生部，举国家行政之力建设“能为人人服务”的“公医制”。这位耶鲁医学博士擘画的公共卫生梦想得以成真。

出身沪上牧师家庭的颜福庆虽自幼接受西式精英教育，却心怀人民情怀，“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视医生为“福人的职业”。对于职业自觉，身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的颜福庆在1931年3月6日给沪江大学医预生所作的演讲《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中阐发得淋漓尽致。耶鲁毕业第二年，颜福庆便奔赴南非约翰内斯堡，为金矿华工医治钩虫病与矽肺病。1911年春，当东北鼠疫沿京汉铁路向南蔓延，颜福庆临危受命赶赴汉口指挥防疫，成立京汉铁路卫生服务部，在沿途各火车站与各公路道口设置监视员与稽查员。

颜福庆与被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前身）授予“鼠疫斗士”荣誉称号的伍连德并肩抗疫，亦携手创建中华医学会，分别出任会长与书记，由此终结中国西医的洋人时代，力求“与欧美并驾齐驱”。该会第二十三届会长就是钟南山。

创建中华医学会之际，颜福庆的身份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创校校长。该校堪与协和比肩。而就在协和医院，孙中山把绝笔书“学成致用”赠予湘雅学子，极致演绎“北协和，南湘雅”之誉。

校名中的“雅”即耶鲁毕业生在华设立的雅礼会。因该会带有基督教背景，湘雅难免仰人鼻息。发展中国医学教育，必须让“吾人有独办之能力”，并“任我国人独办之”。时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的颜福庆遂于1927年创办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前身），1932年使医学院脱离国立中央大学，组建国立上海医学院，并誓言，培育的医师“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绝不“自造庸医，遗患社会”。国立上海医学院果然不啻为公共卫生专家的摇篮。

正谊明道，颜福庆1934年6月把这四个字确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校训，并要求所有毕业生必须庄严宣誓：“余誓以至诚，本余所学，为人群服务，严守医师戒条，终生不渝，并力求深造，克尽厥职，谨此宣誓。”身为一校之长，颜福庆身体力行，即便古稀之年，依然率师生，辗转于长三角，突击诊治血吸虫病和核黄素缺乏症。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可喜！可喜！病日新兮，医亦日进。可惧！可惧！医日新兮，病亦日进……勖哉诸君！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哼唱着校歌，一代代国立上海医学院校友书写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壮丽篇章。

正谊明道，出自“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班固《汉书·董仲舒传》）。谊即义。扶正义、弘大道者仁，而医者仁心。从颜福庆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拓荒，到新时代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百年公共卫生一以贯之的无非四字：正谊明道。

◆海上飞花　海飞

咖啡是一种忧伤的茶

朋友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十点，我正在我的那间房子里写着一些东西，我打算用这些文字去换一些钱，然后邮寄给我的父母，让他们在寒冬来临之前去买一件毛衣。朋友说你来吧我们在等你，我就去了，我是步行着去的，这座小城的黑夜对我来说太熟悉了，门童打开门，拐上楼梯，我见到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平凡的人，但是他们和我在丹桂房的朋友是不同的，丹桂房的朋友都能干一手好农活，而城里朋友的手都是白白嫩嫩的，他们的手适合打牌、弹琴、画画、写字或者是敲击键盘。咖啡很清香，我认定这是一种外国人喝的茶，但是放到中国来，放到蜡烛和音乐声中，放到朋友们中间，它就不仅仅是一种茶了，它是朋友间交流的时候，手里必须拿着的一样东西。

有人在弹钢琴，那是一个披着长发的年轻人，他的脸上还长着青春痘，正是好年岁。朋友们在谈论着最近绘画艺术的流向，或者是一个叫海菲兹的人怎么怎么的，他们还甩着一头雄狮一样的头发说舒伯特怎么了。我诚惶诚恐地听着他们的谈论，生怕被别人知道我对艺术是那么的一窍不通。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我不知道是这中间的谁带来的，她突然说，咖啡是一种忧伤的茶。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马上浮起了家乡的影子，低矮的成片的房屋，三两棵孤零零的树，还有在光棍潭附近的草坡上吃草的羊群。远离羊群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忧伤，它们像蚂蚁一样咬我，让我在这天夜里感受到疼痛。咖啡，真的就是一种忧伤的茶。一不小心少许咖啡溅到桌面上，服务生走过来，轻轻用软软的棉布擦去。我说，小心点，你擦去的是一种忧伤。

◆汉诗节拍　杨达寿

甘愿当一片绿叶

春天是一个多长叶子的季节
一如我倾巢而出的未衰意志
守住尚未老去的那个夙愿吧
和大自然怀里的草木守约
心甘情愿当好一片绿色叶子
绿叶不断接受风雨的洗礼
绿叶不断受宠太阳的恩惠
凭藉一己之长为家人输送一切
月亮最明白我的高位与资格
把李白床前剩余的月色慷慨相赐
善于热暖兼施的太阳不吝瘦身馈赠
善解好意的我选择遮挡与躲避
为了他人心花怒放绿叶甘居人下
为了他人蓬勃壮硕绿叶敢于冒尖
为了他人向上拔节绿叶甘愿退下
为了他人献上甜蜜绿叶不息忙欢……
一片片绿叶呵宛若一对对翅膀
多想向诗画的广袤原野里飞翔
一片片绿叶呵多有高处的信念
多想向美妙的无际云天上登攀
那些日日望不尽的绿附和绿多抢眼
都为草和草树和树有个可靠的依傍
那些劳碌一生落地归根的金黄叠金黄
都为草木未来和我的敬意留下落脚点……

◆世说新语　朱国良

动物也会“教育”人

啸傲山林、搏击长空的走兽猛禽们真是千奇百怪、千姿百态，难怪中央电视台的“人与自然”人见人爱，大家爱看。

想想也真是的，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确也有不少类比之点和可喻之处。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不少口语也往往是借喻动物的表象和习性来生发一点意思的。民间俚语说：“少年如猴，天真活泼；中年像牛，负重前行；老年似狗，替儿看家护院”。不仅调侃味儿重，也倾注一点深意。“龙吟虎啸，大丈夫气概；蚕结蚁引，小女子经营”。旧时人们堂前的这副对联，就是从四种动物借喻两种处世信条的。“龟鹤延年，福寿齐昌”，这又是祝寿贺庆的老句子、好话语。“在天愿作比翼鸟”，这比喻是坚贞爱情的象征。而“昔日同林鸟，今成劳飞燕”，则又当别论了。如果说，陈胜起义时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比得有些狂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先生从“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况；毛泽东从鲲鹏展翅九万里”言志，所比的高尚和深远。

睿智的人总是会借鉴别家之长，善于运用之妙的。他们可以用动物来形容有的人的不可一世和落魄潦倒：得意狐狸强似虎，落坡凤凰不如鸡。更可以用动物之态规范打仗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动物身上找点前车之鉴，作为教训之用。高飞之鸟，死于贪食。深潭之鱼，亡于香饵。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现身说法了！

人与动物，其实相通。常有人以动物之特性喻人的。元人张鸣善之小令《饥时》便这样写道：“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周文王）；两头蛇南阳卧龙（诸葛亮）；三脚猫渭水非熊（姜子牙）！”这比喻如何？不想深究。只是感到动物之中，可学习借鉴之处的确很多。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这是高妙精极的大家风范，一般人是学不来的。实用的倒是我们学习了蜻蜓的“停顿理论”，不是发明了直升机吗？学了青蛙扑腾，我们的蛙泳不是可以渡江过海吗？学了飞禽走兽的各种腾挪滚爬，我们的祖先不是发明了强身健体的“五禽戏”吗？而动物中，与人类可学可比的也甚多。“骆驼——沙漠之舟，生命之船”，由于安徽商人忍辱负重，开创商路，不是被冠之“徽骆驼”吗？据说英国的剑桥大学门首，挂有一具鳄鱼标本，这凶悍的动物，则被人用来表达一种坚韧和勇敢精神。

那么，作为我们堂堂人物要借鉴动物一些什么呢？豺之凶残虎之毒，狼之贪婪蛇之阴，这是万万效法不得的。日常阅读中，“义犬救主”“海豚救人”“老马识途”在感觉神奇中，常常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而我们常说“马有跋涉之劳，牛有忍重之辛”。这一比，则可让我们内省：作为一个有志于事业的人，能不以“不须扬鞭自奋蹄”的老黄牛自律，不以“马作的卢飞快”的骝骥自答吗？“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动物尚且知亲情，何况人乎？这一比，至少也可以叫我们一些不敬重长辈、不孝敬父母的人感到一些汗颜吧！

人是聪明的，因着聪明也可以从动物中借鉴不少东西。生活中我们需要一些真诚和坦荡，就不该向猿学伪装、向雷鸟学乔装，如石龙子一样变色。我们要与自己的同胞们亲情交融、和睦相处，就不该学鸠鸟专侵喜鹊巢、杜鹃尽占“他人”窝、螳螂要吃丈夫肉。我们要杜绝私欲和贪婪，做到清白和廉洁，就得从江浙一带渔民捉鲤鱼中吸取教训：拴住一条雌鲤鱼，在河里放逐作诱饵，雄鲤鱼来追逐，竟会刺伤又返回、逃回又回来，最后死于鱼叉下。

或许，动物的善和恶、贪与懒，这都是一种本能使然。作为人，特别是愿意做一个“大写的人”来说，从中有心有意地反思一点东西，启迪一下灵魂，振作一番精神，在“人生最崇高的职责，就是在世界上做一个人”的标准下，想必也是有些益处。否则，行为处世，无耻卑鄙。死不要脸，真不要脸，臭不要脸，好不要脸，怕要被人们指着脊梁骨，骂一声“禽兽不如”的！

◆人生悔语　俞剑明

名片上的那些头衔

中国最早的名片称作“谒”，起源于秦汉时期。当时纸张尚未发明，所以由木片或竹片削成。拜访者把名字和本人简介写在上面，毕恭毕敬地呈给被拜访者，作为见面的介绍文书。汉语中的“拜谒”“进谒”“谒见”等词可能就源于此。

现在给人名片，不必那么庄重了，只需印上姓名、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信箱、QQ号码之类，便可广为散发。这些年大有借名片炫耀卖弄的，名片镶金镀银，姓名请大书法家代写，头衔少则七八条，多则几十条，正面放不下，反面也用上。有些小印刷店投其所好，搞出一种可折叠的“风琴式”名片，两三页不够用，十几页也可以。有人容颜长得自信，索性把自己的光辉形象都摆放上去了。

名片上那些天花乱坠的头衔，有市级、省级的，甚至有国家级、世界级的，如中国某某研究会会员、中华某某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某某协会名誉理事、国际某某协会特邀顾问……一个比一个吓人。

这些年冒出一批又一批“大师”，名片上什么“书画大师”“陶艺大师”“制壶大师”“歌唱大师”“风水大师”“珍宝玉器大师”“考古鉴定大师”“某某大师工作室”……看得人眼花缭乱。倘若真的在本行业出类拔萃，甚至超越前辈，自封“大师”倒也罢了，只是这些“大师”大多业务平平，自封“大师”纯属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按理教育工作者为人师表，处事最为谦卑严谨，但如今他们中某些人名片上的头衔，细加推敲，水分同样不少。

“著名高级教师”——“高级教师”需通过一定程序申报并由指定组织评定，暂且视作干货；“著名”却是水分，应当挤去。况且别说一位人物，即便是一件货物，真正著名的从来不必自诩“著名”，可曾听到过“著名茅台酒”“著名龙井茶”这样的说法？

“著作颇为丰富”——“著作”也算干货，可全部列出，或择要列出；至于“丰富”却没有客观标准，“丰富”前面的“颇为”两字，则更难以把握。更重要的是，著作应重在质量，而非数量。现实生活中，“著作等身”往往不如“著作三寸”，若是传世之作，更是一部足矣。

“被誉为领军人物”——较之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有着太多让人捉摸不定的因素。比如说，这“军”有多大，是“千军万马”之“军”，还是“孤军奋战”之“军”？“领军人物”之来历更是令人犯疑。只要“被誉为”即可充数，是否过于轻率？

不知道别人感受如何，每每见到名片上的此类头衔，我就心底痒痒地想挤去里面的水分，连带着给名片的主人打个折。

名片虽小，却可让一个人的狭隘、浅薄、虚荣一览无余；方寸天地，同样也可洞见一个人的心胸、识见和境界。

胡适先生有三十二个博士头衔，还有北京大学校长、驻美大使等职务，诗人、哲学家、新文化运动领袖等定评，可他名片上的头衔却只有“学者”二字。“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在胡适心目中，其他头衔都是临时的，唯有“学者”是永远的。

沙叶新先生多才多艺，戏剧、小说、电影、电视、随笔、杂文无不涉足，且硕果累累。二十多年前我在杭州与他初次见面时，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一副自画像，边上写着：我，沙叶新。头衔印着：上海人民剧院院长（暂时的），某某主席、某某委员、某某理事（挂名的），剧作家（永久的）。看着这张别致的名片，我初始忍俊不禁，继而肃然起敬。

1925年某天，奉系军阀张宗昌与少帅张学良、上海滩四公子之一的卢筱嘉喝茶，正聊到兴头上，侍卫转呈某报王姓记者的名片，说是等在门外求见。张宗昌看名片后皱了皱眉，挥挥手说：“切了吧。”侍卫出去后，不一会儿进来报告：“已将那姓王的崩了。”卢筱嘉闻言大惊，问：“为什么杀他？”张宗昌若无其事地答道：“那小子的名片上，光头衔就列了十几条，足见他绝不是个好人，所以还是切了的好。”

看到这里，不知那些以为名片上的头衔多多益善的朋友，额上是否会沁出些许冷汗？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